

### 【主持人语】

一代人的成长总要面对不同的历史命题。“80后”在全球化时代所表现出来的群体特性，既彰显出巨变时代的尴尬和匆促，也昭示了个体心灵空间的逼仄和荒芜。

青年学者羽戈曾指出：“他们的成长历程，正是一个国家通体遍身急剧易变的过程。其间的波澜起伏，已注定了这一代人的性格中多是动荡与反叛的因子。他们的苦难，至少在表面上，是没有特定的历史印记的——因为作为一种呈现的历史总是被快速地颠覆，昨天是海水，明天则可能是火焰——他们的苦难是无根的。”

在消费文化和新媒介面前，“80后”一代没有个体的强健，只有一例的孤单。只有通过复杂的历史参照和现实追问，寻找并塑造出独立的历史意识，进而确定生命坐标，才能摆脱原子化的自我封闭命运，渐次生长出重建社会的公民意识。

胡粲然

## 漫谈“80后”： 认识范畴的两个误区

□解玺璋

如果我要说根本没有所谓“80后”的存在，你一定认为我在睁眼说瞎话。我们怎能对如此庞大的社会人群视而不见呢？而且，我们的媒体不是每天都在拿这个群体说事儿吗？事实的确如此，乍一看，当下的我们几乎被“80后”包围着，他们无处不在，人们谈论任何事情似乎都离不开这个群体。有人要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就一定拉上这个群体。毫不夸张地说，“80后”几乎成了当下某些媒体的“春药”，总能让他们亢奋不已。

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敢肯定“80后”存在的实在性。从具体的生活经验出发，我只知道有生于1980年后的庞大人群，却很难了解“80后”作为一个整体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人们赋予“80后”很多说法，这些说法哪一个更接近事实，而不是出自我们的臆想。在认识论的范畴里，我的这种看法很容易被看做是经验论。从人的认识发展过程来看，这一定也是非常初级的东西。我们对于现实中某一事物的认识，一般说来，总是从

感性上升到理性，从现象上升到本质，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经验上升到理论，通过归纳、综合、概括、抽象等一系列认知方式，形成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知识和叙事。这种思想方法在19世纪经黑格尔和马克思而集大成，它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找到最根本、最本质的一些概念来认识这个世界。本质是意义的来源，是主体得到确认的必由之路。有了这个东西，我们在描述一个事物的时候大约就很坦然，就不会因为师出无名而心存内疚，也就为自己的话语权找到了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依据。

有人从一开始就试图将“80后”本质化。大约进入新世纪以来，有很多人，包括媒体和出版商，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总是通过某些本质的整体性来描述“80后”这个群体，甚至不惜将一些自相矛盾的描述强加在这个人群的身上。比如有人将“80后”比附为“垮掉的一代”，这显然是个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命名。因为，只要对来自美国的这一代人稍加了解，就会发现，中国的“80后”与他们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无论是从否定的角度，还是从肯定的角度，在他们之间，我们都几乎找不到任何一点共同之处。那么，为什么有人还要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中国“80后”的属性和特征呢？道理很简单，他们就是看中了“垮掉”这个词在汉语中的特殊含义，用它来表达自己对“80后”的失望情绪，很方便。在这些人的眼里，“80后”一定是自私的，吃不了苦，怕困难，怕挫折，怕负责任，却又眼高手低，目空一切，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他们贪图享乐，消费至上，只考虑自己是否喜欢，不考虑自己的消费能力，最后只能沦为“啃老”；他们以自我为中心，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既不能与历史建立联系，又游离于社会之外；他们是孤独的，很自傲，也很自卑，内心十分脆弱，容易走极端；他们也反叛，反专家，反权威，反体制，但由于他们对这个社会缺乏必要的了解，所以，他们的英雄行为看上去总像是孩子撒娇；他们没有理想，只有不切实际的梦想，但他们又是最现实的，最看重眼前的物质利益，从小以电视为友，使他们过早地成人化、世俗化了。总之，人们说到“80后”的时候，脑海里浮现的就是这样一群从小娇生惯养，缺少精神信仰，过度自我欣赏，很难融入社会的病态形象。

## 二

不过，有人已经注意到，“80后”这个概念的出现，并非来自这个群体的自我命名，而是有人强加给他们的。而且，所有这些关于“80后”的整体性描述，很显然，并不是对于客体进行了全面的实证性考察之后得出的结论，更多的，倒是来自人们的印象和感受，因此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这里既有对“80后”的歧视，也不排除妖魔化的动机，至少有以偏概全之嫌，所谓一竿子打翻了一船人。然而，有趣的是，在这件事上，始终乐此不疲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父母，即所谓“50后”（可能还包括一部分“40后”和“60后”）。正是这些人，先以溺爱的方式养育了这一代，如今，到了收获的季节，却对自己所培育的果实有一种陌生感，他们为此而忧心忡忡，十分不安。但他们所关注的与其说是“80后”的人生态度，倒不如说是“80后”出现的这一事实。其中的隐忧，说起来还是蛮复杂的。“50后”被一场“文革”剥夺了10年青春，虽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

在“文革”后搭乘恢复高考的末班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但大部分人只能把自己的理想或梦想寄托于下一代。事实上，这一代人几乎没有不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现在倒好，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他们的悲伤也就特别地令人感慨。

我一直以为，要深入了解“80后”，不能不深入了解“50后”。二者不仅有一种血缘上的亲密关系，更在精神上血脉相连。有人已经指出，“80后”的价值观有三大来源，排在首位的，就是他们的父母。其次才是电视和网络。这也算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吧，尽管“50后”一再抱怨“80后”，殊不知，正是“50后”应该对“80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啊！在我看来，我们对于“80后”的认识，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两个误区，一个是将他们本质化，所有关于“80后”的描述，他们的属性和特征，都是整体性的，都被描述为代际冲突。这种急于要将“80后”本质化，要将他们组织在一种整体性之中的需求，我想只能来自“50后”目前比较尴尬的处境。“50后”真正进入这个社会并在社会上发挥重要作用时间并不很长，至今他们也不能摆脱年长一辈的身影，而他们已经到了将要退出这个历史舞台的年龄，很有可能，他们不会给历史留下更多的痕迹。所以，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客体”来确定自己这个“主体”。

日裔美国学者酒井直木有一种观点，他在分析解释学作用的时候，提到一种机制，即所谓“调节异质分布”。他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时每刻都会遇到与自己不同的东西，我们需要在话语中调节这种不同。也就是说，如何分辨这种不同与那种不同，如何区别它们的重要程度，你就必须定义它，限定它，使它的意义分布开来。据说，“分布”这个词还是从经济学或心理学那里借用来的，因此，也可以说，调节异质分布的过程恰如一种话语上的经济系统。那么，怎样来调节分布呢？他告诉我们，在进行这种调节分布之前，解释学先要假定有一种完全同一的、没有异质的存在状态。在这里，我们的世界与我们的语言是完全重合的，在这种语言中，我们不会产生疏远感，语言与世界之间也不会产生距离感。于是，在解释学家的眼里，我们的世界就成了一种理想的领域。但事实上，这种完全同质的领域是不可能存在的，是一种理想的范畴，类似于康德的“先验形式”。

正因为解释学假设了这样一个先验的领域，所以，在遭遇到异质的时候，主体就可能产生一种批判性的分辩。由于在自身领域中语言与存在是完全同一的，很难把语言客体化，因此就需要假设一个“他者”。虽说事实上异质总是本身具有的东西，是存在于每一种语言中的组成性要素，但主体为了维护自己虚假的统一，它只能将这种异质推出去，交给他者。只有这样，异质变成了一个客体，主体的意义才能够产生出来。酒井直木告诉我们，异质本身并不是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之间的问题，而是我们的语言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在近现代历史上，西方就是通过把自己的异质“分布”给日本人、中国人或其他非西方人来认识和肯定自身的。很显然，这种同质与异质的二元对立，是在解释学的话语中虚构出来的，它基本上排除了产生这种对立关系的历史原因。然而，作为一种分析方法，我想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启发。事实上，当我用这种方法来思考“50后”与“80后”的关系时，我的心情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我希望能为这种对立找到一点

理由，以抚慰我们不安的心灵。这大约就是我们所说的变化，时间的变化，时代的变化。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点类似于杰姆逊在讲到叙事分析时所说过的，如果故事都是一个共时的系统，那么，讲故事的人就要制造出一种时间的幻觉，即历时性的幻觉。

### 三

尽管我们将“50后”与“80后”的关系描述为一种同质与异质的二元对立，而这种对立基本上是在解释学的话语中虚构出来的。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忽略产生这种对立关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这也就是我所说的，在如何认识“80后”的问题上，我们还存在着另外一个误区。我看到很多对“80后”的批评，往往将他们的问题归结为自身的缺陷，好像只是这一代人有问题，缺少了历史和社会的维度。这是不真实的，也是不公正的。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80后”与“50后”的关系，我们也从众多的关于“80后”症候的描述中看到了“50后”的精神遗传；而马克思也说过，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很显然，我们应该把“80后”与“50后”的关系，看做是他们作为人的社会属性之一。他们不是天外来客，也并非像孙猴子一样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们有自己的出处。即使孙猴子，也是经过了天地孕化的呀！更何况，他们始终属于一定的社会形态，这就是1980年后中国的社会现实。他们是1980年后中国社会现实这个“天地”孕化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们，见证了中国社会近30年的历史演变，他们就是这种演变的成果之一。

对于“80后”来说，首先指的就是生于1980年至1989年的那一群人。据说，这是一个拥有2.8亿人口的庞大群体。在中国，这个群体的诞生伴随着两件大事，一个是国家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再一个就是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如果说“80后”拥有以往任何一代中国人都不曾有过的成长经历的话，那么，这两个因素一定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事实上，自他们出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着急剧的变革，不仅经济建设快速发展，成就显著，社会结构的转型也十分激烈，科学技术的发展则更为迅速，尤其是人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其变化更是惊人的，许多东西被颠覆、被改写、被置换，单一的精神统治变为了多元共存的新局面。正是这种宏观的、无处不在的、每个人都置身于其中而无法选择的社会环境，构成了我们认识和理解这一代人的成长过程及其结果的基本背景和客观前提。为什么一个人的精神成长竟会变得如此困难？至今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而我相信，这个答案一定隐藏在30年来中国社会的成长和发展进程中。

这是就社会关系而言。在家庭关系中，绝大多数“80后”都是独生子女。“四二一”的家庭结构，使得他们从一出生就注定了被人关注、被人呵护、被人描述的命运。他们不仅备受宠爱，也被寄予了无限的希望，是所有家庭中心的中心，重点的重点，曾被称为“小皇帝”和“小公主”。在西方社会，以自我为中心曾被认为是过度崇尚个人主义的结果，但在我们这里，至少还有家庭环境的影响这个原因。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习惯，正是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自然而然地养成的。现在我们觉得“80后”的行为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很少顾及他人和集体，缺少合作精神，那么，造成这种病态的正是他们的生长

环境。而这个环境除了家庭，也还包括社会。事实上，自80年代以来，自我的确立，个性的张扬，对竞争的推崇，甚至个人主义被重新认识，这些都是借助于解放思想被广泛接受。然而，相对于以往的对人尤其是对个人的忽略，80年代重新发现了人，发现了人的价值，特别是个人的价值。这场关系到人的解放的运动，至今也还没有结束。在很多时候，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常常还要受到各种权力的忽略甚至践踏。即使这样，我们也还是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完全得益于人的解放，自我的解放。但是，它也把个人主义的逻辑引入了一场人人皆敌的混战，把对幸福的追求引入了只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恋主义的死胡同。由此可见，当我们把“80后”放在历史和社会这个维度中的时候就会发现，要对他们的某些行为作出合理的、公正的评判其实是很难的。道德式的谴责变得如此地浅薄和没有意义。因为，在社会历史的演变中，我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一些批评“80后”的人抓住这种表面上的道德问题做文章，其实是忽略了中国社会进步的基本点和复杂性。

关于物质欲望、贪图享乐、消费至上、拜金主义，这些困扰“80后”的种种问题，事实上，早在80年代就有人打着要把我们从以往被压抑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幌子得以抬头。人们从弗洛伊德那里知道了超我、自我和本我，而超我对本我的压抑被认为是人性扭曲和异化的主要原因，人的解放也就自然而然地包含了解放本我的内容。这些年来，人们已经将那种清教徒式的生活视为反人性的生活方式。这使得人们大胆地相信，“享受金钱带来的生活乐趣是无可非议的”。而现代社会中大众传播媒介对商品以及舒适生活的大肆宣传，更使得人们越来越把满足其消费冲动视为理所当然，并使得人的本我不必再为其形形色色的欲望而感到内疚，或对这些无边无际的欲望加以掩饰。这些被冠以“新观念”的观念，在“80后”成长的20多年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他们在当今所表现出来的种种“不良”习惯，我以为都和这个时代的风尚密切相关。实际上，任何对于“80后”的批评和检讨，最终都将归结为对近30年来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批评和检讨。这才是“80后”这个群体最为独特的历史命运。

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危机、竞争和不确定性的年代，我相信，不仅“80后”，很多人都将深受焦虑、沮丧、莫名的不满和内心空虚的困扰。在这里，最值得警惕的，是要防止有人把“80后”的集体怨愤转变成为可由精神治疗处理的个人问题。我们看到，许多带有“80后”标签的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最终都被归结为心理问题。好像今天的人们不再渴望灵魂的得救，而只是获得一种生活富裕、身体健康、内心安宁的感觉，或者说，一种片刻的幻觉。于是，于丹式的心灵抚慰就成了救世度人的灵丹妙药。然而，这毕竟解决不了“个人的精神成长与发展为什么竟会变得如此艰难”这个“80后”所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而只能将他们引向歧途。■